

1926年6月，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最后一次来华，负责处理两件大事，一是中共内部受国民党右派打压情况，二是即将开始的北伐。

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在这次久违的大会上，维经斯基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决议案，并由中共代表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大会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好像举行一种仪式，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以至会议记录员郑超麟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看似平静的四大却诞生了一系列不平凡的决议案，特别是凝聚全党智慧结晶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大会还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

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提出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并决定被分配做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再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联系，在国共合作中保持

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尤其经维经斯基调解，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组成预算委员会，确定共产党的经费数额，同时中共在工作中接受鲍罗廷指导。1925年2月15日，回到莫斯科的维经斯基还发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封信，再次强调来之不易的共识，“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

最后的岁月

为了增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原则上同意在上海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4月27日远东书记处正式同意并经政治局批准成立该局，由维经斯基担任局长。中共

下图：维经斯基的故乡涅维尔。



方面由陈独秀总书记和瞿秋白作为代表加入远东局。1926年6月，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最后一次来华，负责处理两件大事，一是中共内部受国民党右派打压情况，二是即将开始的北伐。

此次，维经斯基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主张“从内部反对右派”，要求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以切实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大力加强国民党左派，联手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对于箭在弦上的广东革命政府北伐，维经斯基协调了中共与莫斯科的不同立场。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就是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集体意志的产物。此后，维经斯基又与远东局另两名成员拉菲斯、福京一起，到当时中国革命圣地广州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并向莫斯科提交了两份考察报告，着重分析国民党右派反复制造分裂摩擦的原因、后果以及共产党面对此后果所应采取的对策等。

考察结束后，维经斯基留在上海工作。北伐战争发起后，他遇到极大的阻力。1927年6月，维经斯基起程归国。

自从1927年回到苏联后，维经斯基先被派到伊尔库茨克负责农业生产工作，1930年来到莫斯科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1935年成为教授。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参加民兵组织，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不过，他的战斗生涯没持续多久就被克里姆林宫召回了。1953年，患病的维经斯基在手术过程中去世。■